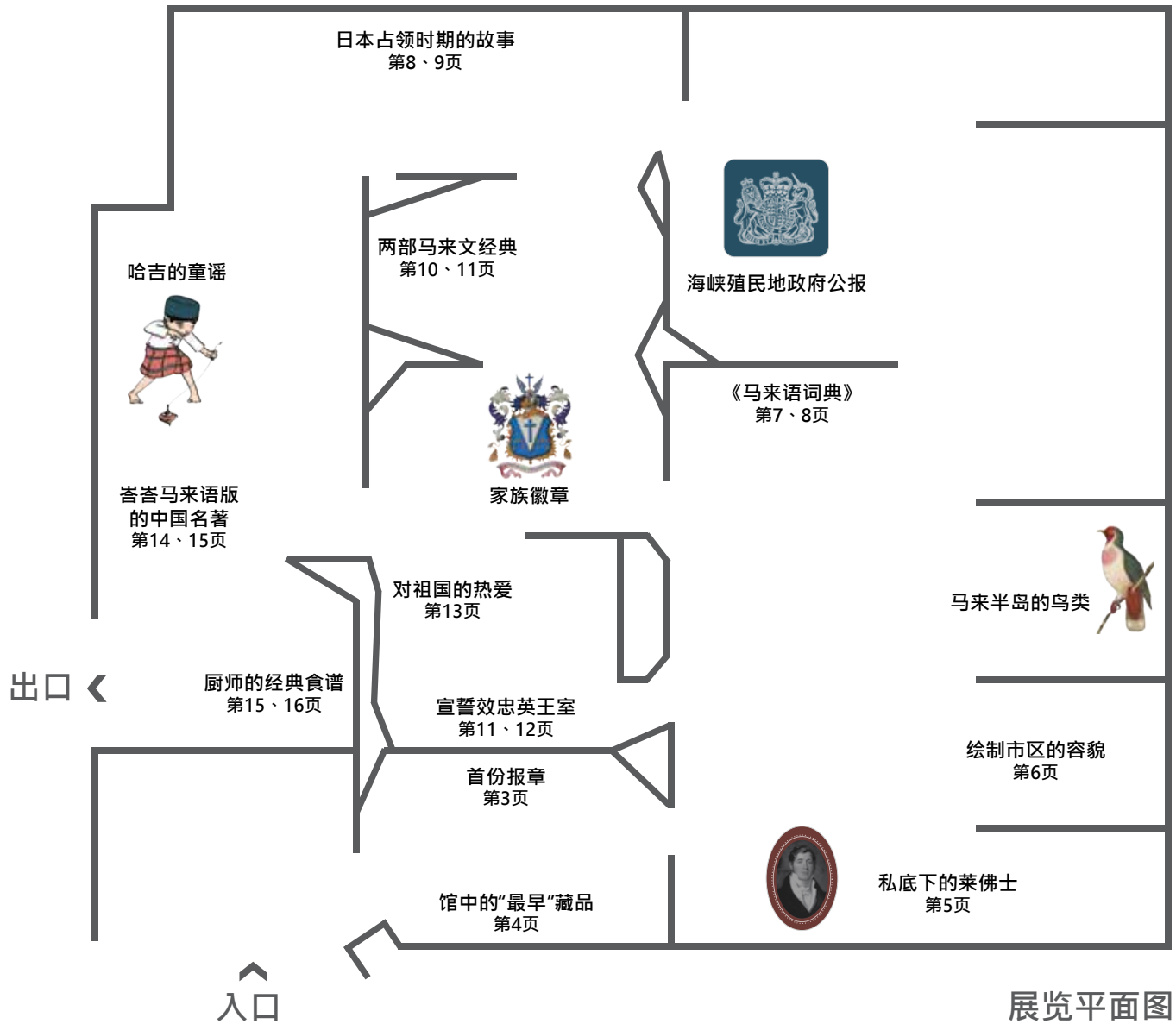


“书库珍品” 展览展馆指南

2016年1月30日至8月28日



Highlights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展览主办机构



简介

新加坡第一座图书馆的成立，与开埠者莱佛士（1781年至1826年）有着密切的关系。莱佛士认为新加坡的未来不应仅是个商业枢纽，也应该是一个教育与文化的中心。他倡议建造的第一所学校的计划书就包含了图书馆，博物馆和印刷社。这所学校，即新加坡书院（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于1823年成立。学校内的图书馆后来成为第一座会员图书馆，即新加坡图书馆（1844年至1874年）。这座图书馆进而成为莱佛士图书馆（1874年至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又被改名为昭南图书馆（1942年至1945年）。1960年，这座图书馆成为国家图书馆。

自创馆以来，通过购买或取得其他图书馆和私人的藏品，以及多位捐献者慷慨的捐赠，国家图书馆逐步建立了一个数量显著并极其珍贵的馆藏；丰富的藏品包括原始和印制的资料，以供研究人员钻研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各类课题。馆藏中的部分珍品被挑选出来在本展中展示，让参观者一窥早期新加坡社会的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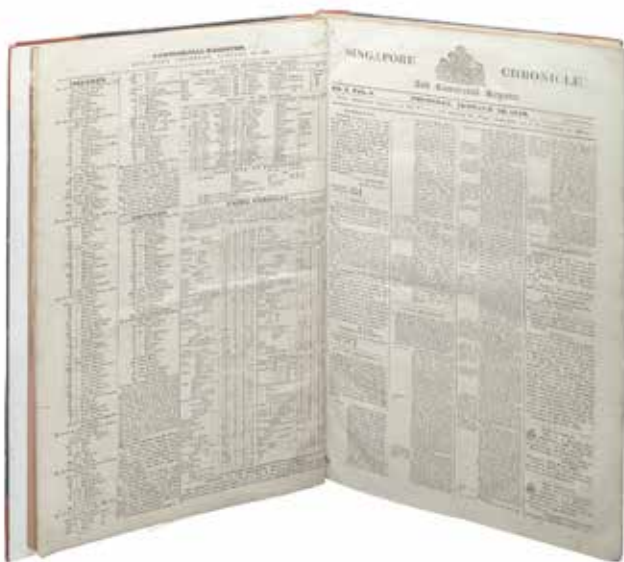
图书馆的旧印章

首份报章

《新加坡纪事报》(Singapore Chronicle and Commercial Register) 是第一份在本地出版的报章。这份英文报由殖民政府出版，并由新加坡第一家印刷社（伦敦宣道会的Mission Press）承印。该报于1824年创办，但直至1830年才购置了自己的印刷设备。由于多重客观因素，直至1835年该报都是新加坡唯一的报章。

当时，印刷技术在新加坡极度匮乏，而Mission Press是唯一的大型印刷厂。其次，在1823年，殖民政府颁布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的法令，即未经英国当局审查和批准的刊物都不得印刷出版。虽然此法令并未严格执行，但资源短缺和印刷限制等因素都不利于报纸的出版发行。直至该法令于1835年废除，这种情况才获得改善。

出版限制法令于1823年的废除最终导致了《新加坡纪事报》的停刊。面对其他报章如《新自由西报》（于1835年创办）的激烈竞争，《新加坡纪事报》最终不得不于1837年停刊。《新自由西报》最终衍变为《海峡时报》，是新加坡的主要报章之一。随后，其他语文的报章，如《星洲日报》、马来报章Jawi Peranakan、淡米尔报章Tamil Murasu，分别于1923年、1876年和1935年创办，这些报纸的出版发行使报章读者的人数大增。



《新加坡纪事报》（1833年1月至12月）

新加坡：新加坡纪事报社，1833年出版

除了转载欧洲与其他区域的报道导章，《新加坡纪事报》也刊载本地与进口货品的当前价格，以及新加坡进出口商品的明细表（左图），因此该报内容成了东南亚早期货品交易情况的最佳纪录。随着新加坡逐渐发展为转口贸易港，入口商品经常在港口转运到其他地方。

在1833年入口到新加坡的商品包括丝绸、糖果、金粉、各种酒水、书本、法国棉制手绢、水牛皮；和腌制牛肉。出口的物品包括锡、藤、啤酒、鸦片、西米，以及来自中国的茶叶、瓷器、宣纸和丝绸。

馆中的“最早”藏品

新加坡的早期印刷史是与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在本区域的传教工作密不可分的。莱佛士于1819年在新加坡建立贸易港之后不久，传教组织便在这里设置了印刷社，以出版和派发基督教的印刷品。由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结束前，在中国传教是非法的，因此西方传教士选择在东南亚，包括新加坡，设立传教据点，希望最终能将基督教传入中国。中国因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大批传教士离开新加坡，也随着带走了大部分的印刷设备。

最早在新加坡出版的书籍也是利用传教士的印刷设备印制的。直到1860年代，新加坡的本地社群才开始发展印刷业务。

这是本馆藏书中最早在本地印刷的中文书，内容是关于基督教的简论，由德国传教士爱汉者（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年至1851年）撰写。这本书主要记载了《圣经·马太福音》里耶稣的讲道“登山宝训”，以及其释文。

郭实猎是亚洲传教史上一位既重要又极具争论性的人物。他于1826年来到东南亚；他从爪哇岛一路往北，途经民丹岛、新加坡和曼谷。由于他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教，因此他于1831年移居澳门，从那里前往中国的沿海和邻近地区传道，及派发宣教刊物。这样的举动在当时是违反中国法律的。在1831至1843年之间，郭实猎撰写了近五十部中文著作，《全人矩矱》便是其中一部。为了维持其传教工作，郭实猎为售卖鸦片给中国人的英国公司担任翻译，此举引来了其他传教士的极力抨击。

与《全人矩矱》一同展出的是本馆藏中最早于本地印刷的马来、淡米尔，和英文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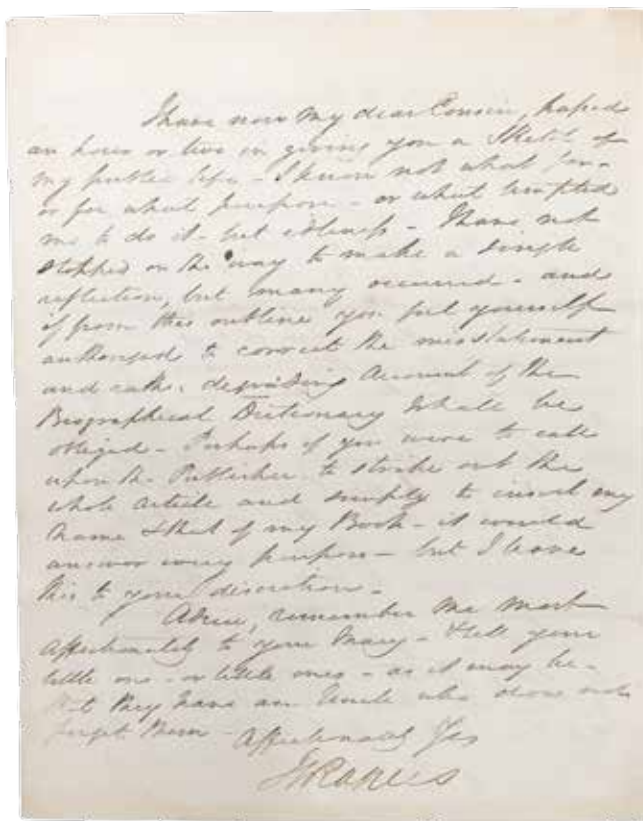
《全人矩矱》
爱汉者（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作

新加坡：坚夏书院，1836年

私底下的莱佛士

历史上，有关新加坡开埠的过程主要依赖开埠者史丹福·莱佛士（1781年至1826年）的自传、目击者的笔记，以及莱佛士写给亲友和支持者的大量信件等内容来了解。莱佛士一生写了大量信件，而许多与他通信的对象是在当时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人士，因此他们的书信内容是这方面研究的极其珍贵原始资料。

这些年来，国家图书馆逐步收购了一小批莱佛士及与他相关人士的亲笔书信。虽然莱佛士的大部分信件内容着重于他的事业及公开事迹，但也有一部分私人信件保存下来，让后人得以一窥他较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他的性格也有更多了解。



莱佛士致堂弟汤姆士·莱佛士牧师的信件
汤姆士·史丹福·莱佛士（1781年至1826年）手迹

在海上，1819年10月14日
约翰·巴斯廷博士特藏

1819年，莱佛士读到由亨利·科尔伯恩于1816年撰写的一部传记辞典补遗，里头暗示莱佛士之所以会被任命为英国驻威尔斯太子岛（槟城）政府的助理秘书，乃是因为他娶了奥莉维亚·马莉安妮·德夫尼什（1771年至1814年）为妻；而当时谣传她与东印度公司的首席秘书威廉·拉姆齐有私情。这促使莱佛士写了一封信给身为牧师的堂弟，汤姆士·莱佛士牧师（1788年至1863年），声明这个说法不实，并强调他的成功全靠自身的努力与好运气。

这封长信是莱佛士所写唯一的自传性书信；除了在信里详细描述自己的事业进程外，莱佛士也回忆了早期的贫困生活。由于家境不佳，莱佛士才刚满十四岁便辍学到东印度公司担任书记。虽然生活坎坷，但他靠着孜孜不倦的自修，学习了法文、英国文学和科学。

绘制市区的容貌

由于国家图书馆收集各种对新加坡文化遗产的纪录和资料，因此地图也是馆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世代以来，人们利用地图来进行规划，或从一处旅行到另一处。

这幅等高线图是将地表高度相同的点连成一条环线，不同高度的环线不会相合，以显示某地的地形水平曲线，是进行工程与建筑时的重要资料。这幅等高线图是由殖民地政府的市政部工程师绘制的工作文件。市政部负责提供公用设施如水、电、煤气、道路、桥梁、街灯等等。当时市政部的责任工程师是大卫·B·麦克莱 (David B. McLay)；他于1919年来到新加坡，在1923年10月至1930年间就任于市政部。

这幅地图是专为道路规划而绘制的——图中倡议修建一条环路来缓解市中心的交通拥堵。本图是以手绘于麻布上，比纸图更坚固，也更适于随身携带到工作场地去。那些倡议修建的新路以深红色标示，它们将环绕市区的外围。新道路的宽度也标在图上——有些六十英尺，有些则宽达八十英尺（分别为18.3米和24.4米）。市区现有的主要道路的哩数，以粗体数目字标示出来。作为零起点的邮政总局（现今浮尔顿酒店）却没有标示出来。此外，新建道路的排水设备也非常重要，因而图中也显示了多个排水系统。

这幅地图也显示了未来火车轨道的改道，新轨道以细虚线标示。后来，从登路到武吉知马的轨道于1936年至1937年间拆除。这幅地图也标出了数条河流，如新加坡河及加冷河的港口限制线。



手绘新加坡市区等高线图的细节
大卫·B·麦克莱作

新加坡，1929年
许少全先生捐赠

《马来语词典》

千百年来，各路商贾云集东南亚。想要在当地顺利地从事贸易活动，能与当地人流畅地沟通便是成功的关键。由于马来语是东南亚沿海地区的通用语言，因此古人使用单词表和双语词典来学习马来语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最早的单词表是由华人编制的，并且早在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登陆马六甲之前就已经编制完成了。



英巫、巫英双解词典

汤姆士·包瑞编写
伦敦：Sam Bridge for Author出版社，1701年

这本词典是英国商人汤姆士·包瑞(Thomas Bowrey, 1650年至1713年)于1701年编写与出版，是史上最早的英语-马来语词典。根据序言的介绍，本书依据包瑞在1670年代至1680年代的19年间在“马来”列国的航海和贸易经历编写而成。包瑞之所以决定编写这本词典，是因为此前并没有任何这类词典，而他相信这本词典对其他商人也有助益。包瑞将马来语词条翻译成了罗马字母表，但是没有将相应的爪夷文（以经修改的阿拉伯字母书写马来文的文字）拼写包含到词条中，这在一个世纪

后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尽管如此，包瑞的词典在早期仍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除了词条以外，这本词典还包括了语法规则，例句，对话和信函样本的篇章。对话能帮助解释词语如何使用，并提供会话例句方便学习者背诵。词典里大多数对话围绕着贸易主题，例如航海事宜，以及两个商人之间关于买卖香料的对话。



英巫、巫英双解词典的地图细节

汤姆士·包瑞编写
伦敦：Sam Bridge for Author出版社，1701年

这本早期的词典使用汉字拼出马来词汇的发音，来帮助南洋华人学习马来语。这本书是由林衡南（又名林光铨）为新加坡操闽南和潮州方言族群编写的。第一版《通夷新语》于1877年由林衡南自己的印务馆—古友轩出版。林衡南在序言中提到，1883年出版的新版本是改进版本，强调了学习马来语对于在该地区开展贸易和商业活动的重要意义。



《华夷通语》
林衡南

新加坡：古友轩，1883年
椰阴馆藏书，陈育崧捐赠

本词典收录了2,800多个词条，并按照主题将这些词条划分为地理、数字、职业和动物等25类。为达到更精准的马来语发音，建议读者使用泉州或漳州方言发音，在书中分别使用三角形或撇号表示。（漳州方言更接近潮州话）。圆圈表示词语采用口语发音而不是书面语发音。本书的其他部分按照词条汉字字数进行分类。同一分类中再按照动词和形容词进行分类。

林衡南也是中文商务报纸《星报》的创始人，他于1890年创立了该报。

两面墙壁上的词语选自《华夷通语》。

- △ - 泉州方言
- 、 - 漳州方言
- - 采用口语发音而非书面语

日本占领时期的故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转折点。对马来西亚而言更是如此，马来西亚先是历经战乱，然后又被日本占领（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不幸的是，由于日本军方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英国和日本的大量书面记录，因此日本政府鲜有这次战争的书面记载，特别是缺乏囚禁在樟宜的战俘档案。由于缺乏战前与战后人口普查的资料，很难确定在日本占领期死亡的平民确切人数。

但是，保存在图书馆的各种刊物和珍贵文献从日本政府、本地社会和英国政府等不同的视角揭露了新加坡在日本占领期间以及战后的事实。



《昭南新闻》

新加坡: Syonan Shimbun-kai,
1942年

《昭南日报》是《昭南新闻》(Syonan Shimbun)的华语版本。“昭南”的意思是“南方之光”，是占领期间日本对新加坡的称呼。《昭南新闻》是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日本政府的报纸和官方喉舌。

与英文版类似，《昭南日报》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由于这份报纸还刊登各种商品的价格，因此是战争期间反映商品价格随着供应量起落而波动的重要信息来源。通过这份价格表，我们了解到日占时期的食品价格上涨到几近战前价格的三倍。大多数民众因为厌倦了报纸的政治宣传和前线战情的虚假报导，不再阅读《昭南新闻》和《昭南日报》。人们买报纸只是为了阅读上面的物价表、广告和偶尔的政府公告。

1945年9月12日，日本在市政大楼（今天的政府大厦）签署了《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归还给英国。虽然占领结束了，但是动乱并没有结束。这本日记从1945年8月8日到1946年4月21日，向我们呈现了战后新加坡鲜为人知的一面，以及其面临的军事后勤和政治环境。



登布西将军(Sir 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
，1945年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馆藏

这本日记属于登布西将军(Sir Miles Christopher Dempsey, 1896年至1969年)，登布西山(Dempsey Hill)正是以他命名；登布西将军是从投降的日本人手中收回马来亚和爪哇的英国战后军事行动领导人。他的日记记录了他在收复和重建马来亚和爪哇的工业和基础设施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也可从日记中窥探日本正式投降之前的情景：从原子弹轰炸日本的那一刻起，盟军便制定计划以在日本投降后收复整个欧洲、北非和亚洲领土。我们在日记中看到，在日本发出正式投降公告的前几天，Dempsey将军已经在等待指示以便立时调动部队接收领土。

两部马来文经典

《马来纪年》（*Malay Annals*）和《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历届文科学生必读的两本马来文教材。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就已在本地学校课程中引进了这两本教材。

Sulalat al-Salatin 或《国王谱系》（*Genealogy of Kings*）（又称《马来纪年》）讲述了关于马六甲苏丹国（*Melakan Sultanate*）兴衰的故事，这本书可能创作于16世纪中期。

另一本书《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出版于1849年，由阿都拉·本·阿卜杜尔·卡迪尔（*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1797[?]年至1854年*）以宫廷之外的人和事创作而成。这本书是一本回忆录，作者记载了19世纪初新加坡、马六甲、柔佛和廖内-林加王国的社会及政治面貌。阿都拉向许多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教授马来语，他还是一名翻译家和马来印刷业的先驱。

除了蕴含的文学价值以外，这两本教材被选定为政府学校教材还另有原因。《马来纪年》讲述的是马来王朝的治国之道，强调封建式的忠诚，并且描绘了伟大的马六甲王朝最终被欧洲人打败。而《阿都拉自传》则包含对当代马来社会的批评。

直至今日，这两本教材因为包含本地早期历史故事而仍为众多学者研读，并且依然适用于新加坡社会。下面将重点介绍《阿都拉自传》。

阿都拉（1797[?]年至1854年）不仅创作了这部作品，而且在采用石版印刷术印制这本书之前还亲自手写该作品。阿都拉被称为“马来印刷之父”，而他的回忆录被认为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出版物之一。阿都拉在马六甲时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 1796年至1857年*）那里学会了印刷术。这本印刷书籍的印量不大，并且应当时总督巴德沃尔（1801至1856年）的要求，特别声明专献予他。



《阿都拉自传》
阿都拉·本·阿卜杜尔·卡迪尔

新加坡：Mission Press, 1849年
Reverend George Frederick Hose 捐赠

虽然阿都拉的批评者称他为英国殖民者的喉舌，但是我们应考虑到当时他需要为欧洲人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自传中，阿都拉还想方设法地提出了对马来社会或英国当权者的批评意见。透过这本自传，阿都拉表达了接触西方文明时所面临的挑战；为此他敦促马来人在采纳新思想的同时，务必保留自己的文化和宗教。

宣誓效忠英王室

1869年12月3日，一群新加坡华族商人在总督府招待会上把效忠英国王室的一份颂词献予爱丁堡公爵，即阿尔弗雷德王子（1844年至1900年）。他们的代表陈金钟（1829年至1892年）是一位杰出的华社领袖和暹罗领事。

阿尔弗雷德王子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子，他是第一位访问本区域的英国王室成员。这份颂词表达了这群华裔对女王坚定不移的忠诚，并且对促使他们在岛上繁荣昌盛的英殖民政府表示感激。

这次和随后的王室访问受到了盛大欢迎。对华社而言，这是他们展示新加坡华人社群丰裕兴旺的最佳时机。这类盛大的仪式和欢迎场面能够提醒本地民众：统治他们的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公开表示效忠英王室的做法在新加坡十分盛行。

凑巧的是，另一名商人章芳林也在同一年成为获中国清政府授予官职的第一位新加坡华商。虽然这个封官是为了奖励章芳林对福建省的捐赠，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买官行为，又称捐官。章芳林可能是本地第一位捐官者，但是捐官很快便成了一种风气。清政府推动捐官不仅仅是为了从中谋利，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在海外华人之间培养对中国皇帝的忠诚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清廷于1877年在本地设立了领事馆。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者也培育了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忠诚度。



致阿尔弗雷德王子（爱丁堡公爵）的颂词

新加坡：1869年11月25日
Geoffrey Edwards 捐赠



该颂词以英文和中文以金墨写在丝绸上；背面则是一幅新加坡实景图，中间部分画的是直落亚逸地区。这幅实景图完全复制了画家 Percy Carpenter 在1856年绘制的油画作品《从华利山俯瞰新加坡》（*Singapore from Mount Wallich*）。

这是一份绝无仅有的藏品，因为它列出了当时80位重要商人的名字。最主要的商人的名字出现在前几行。英国殖民政府重视商人并给于特别待遇，因为商人能够帮助促进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因此，富商经常倍受礼遇。一些富商被授予立法议会或市政局议员，或太平绅士之类的衔头。一些著名的华商都曾获英国人授予类似名衔，其中包括陈金钟、胡亚基（又名黄埔先生，1816年至1880年）和章芳林（1825年至1892年）。相比之下，在中国，学者或士大夫阶层在传统上被视为社群显贵。而在新加坡，想要成为社群领袖，富裕的华商必须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因为新加坡非常重视这些美德。

对祖国的热爱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和忠诚度是复杂而多方面的。那些在中国出生、后来到东南亚寻求生计的移民在文化和政治上认同并忠于祖国。另一方面，土生华人世居东南亚多代，并且繁衍出混合体文化，一般认为自己隶属于英国殖民政府。在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政局和社会变化对海外华人具有重大影响力，重新燃起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事务的兴趣。

新加坡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很独特的角色，华人社群参与了许多中国的重大事件。下面介绍的出版物是这种特殊关系的最佳见证。

孙中山（1866年至1925年）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他肯定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传曾说过：“华侨为革命之母”。新加坡曾经是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东南亚根据地。1905年，同盟会（即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分会。这是孙中山成立的推翻清朝统治的地下抵抗运动协会。著名的新加坡商人张永福（1872年至1959年）任首届副会长。



张永福是一位土生华商和橡胶园主，他是孙中山革命的坚定拥护者，并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所著的回忆录《南洋与创立民国》记载了孙中山在新加坡的革命活动和本地支持者的贡献。书中洋溢着张永福对革命领袖的钦佩之情。



这本回忆录还包含大量的革命资料图片，如信件、备忘录、捐赠收条、照片等，甚至包括中华民国国旗的设计图。

《南洋与创立民国》
张永福

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
椰阴馆藏书，陈育崧捐赠

峇峇马来语版的中国名著

土生华人，即峇峇，是生活在马来半岛的混种文化的华人社群。他们的语言峇峇马来语实际上是马来语与闽南语的混合体。

备受读者喜爱的 *Sam Kok* 是中国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峇峇马来文译本，《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十四世纪的作家罗贯中。早期土生华人文学的主要作品是将《三国演义》和其他著名的中国古代小说翻译成峇峇马来文。这类的文学作品被称为 *chrita dahulu-kala*，大意为“古老的故事”；最早的出版物出现于1889年。

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 *chrita dahulu-kala* 反映出峇峇社群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在此期间，这个社群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中国和英国的文化。从中国到来的大批新移民使峇峇更加自觉地融入到中国和马来文化中。在这之前，土生华人参与了马来人的口述文学与手稿文学传统，因此这类 *chrita dahulu-kala* 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创新，即是用马来文来强调华人身份的认同。与此同时，英语逐渐取代了马来语，成为土生华人的母语。*Sam Kok* 这部作品中便反映了土生华人这种复杂的多语言环境——中文小说被翻译成峇峇马来文，却使用英文字母（拉丁文）来拼写。

曾锦文（1851年至1920年）将*Sam Kok* 翻译成30卷的连载版，在1892年至1896年间陆续出版。*Sam Kok* 的每一卷开头通常都是译者序言。曾锦文先是罗列一些读者来信、诗作和词语解释，然后附上主要人物插图，接着才进入故事正文。故事中穿插着带有风格类似传统中国木刻画的插图。



Chrita dahulu-kala, namanya Sam Kok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Siok, Gwi, Sama Gor di Jaman 'Han Teow'

曾锦文
新加坡：金石齋出版社（Kim Sek Chye Press），1892年至1896年



曾锦文（1851年至1920年）



*Chrita dahulu-kala, namanya Sam Kok
Atau, Tiga Negri Ber-prang: Siok, Gwi, Sama
Gor di Jaman 'Han Teow'*

曾锦文

新加坡：金石齋出版社 (Kim Sek Chye
Press) ， 1892年至1896年

Sam Kok 丛书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读者和译者之间的互动。在序言中，曾锦文分享了他的家庭生活、工作，甚至照片。他还刊登了读者对前几卷的好评。这些读者来信以中文、马来文和英文书写，清晰地反映了土生华人的多语言环境。曾锦文是一名尽职的翻译者，他还用马来文和英文对华文词语进行解释。

曾锦文使用的笔名Batu Gantong，也是檳城公墓的名称，这或许暗示了曾锦文心中想要的最终安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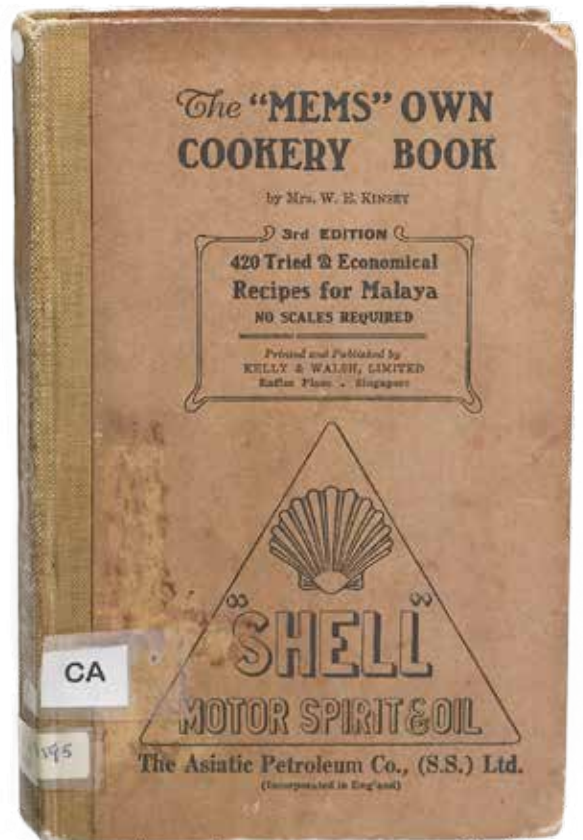
厨师的经典食谱

饮食是我国历史和文化的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历史确实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很多方面。新加坡的饮食文化受到许多不同菜系的影响，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无论是马来半岛、中国、印度、阿拉伯或欧洲的饮食文化，都对我国的美食和烹饪方式带来显著影响。

直到二十世纪初，新加坡才出现介绍本地美食的烹饪书籍。展览展出了数本最早在新加坡撰写和出版的食谱。《主妇烹饪书》(*The Mem' s Own Cookery Book*) 是最早在马来亚出版的烹饪书之一，作者金赛夫人(Mrs W. E. Kinsey)是一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的英国妇女，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920年问世。此外，《我最喜爱的食谱》(*My Favourite Recipes*) 可能是新加坡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烹饪书，由艾丽丝·汉蒂(Elice Handy, 1902至1987年)在1952年出版。多年来，《我最喜爱的食谱》已重印过10次，上一次重印是在2014年。汉蒂所提供的日常家庭简易食谱被称为“新加坡烹饪圣经”，已成为本地厨房里的经典食谱。这两本烹饪书也反映了它们出版的年代。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主妇烹饪书》。

作者金赛是一位马来亚主妇“mem”，这个词语最早在印度使用，称呼来自欧洲的家庭主妇，一般指殖民地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妻子。金赛的烹饪书就是为这些欧洲主妇编写的。她了解居住在马来亚的主妇在一个新的国家准备家常菜时所面临的挑战。因此，她介绍了在马来亚烹饪的方法，并罗列了所用食材在本地的计量和名称，也为初到马来亚的主妇们介绍了食材的合理市价。

在1920年代，马来亚的居民度过了食物短缺的艰难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爆发后导致运输中断，造成亚洲的进口欧洲商品短缺，很难找到烹饪英国菜肴的食材。金赛曾经面对这个难题，因此她的食谱经常使用马来亚现有食材来取代欧洲食材；例如，她用燕菜（agar agar）代替明胶，用椰奶代替奶黄（custard）。这种做法创造出了许多混合菜式，例如“咖喱鹿肉”（Jungle Deer Curry）和“姜霜”（Cream of Ginger）。



主妇自己的烹饪书》：420个可靠且经济的马来亚食谱（第三版）

W. E. Kinsey

新加坡：Kelly & Walsh出版社，1929年